战士·学者·诗人

——缅怀敬爱的影秋同志

王 俊 义

随着时光的流逝，影秋同志离开我们已然数月，但我依然悲怀难抑。每至夜深人静经过一天紧张的工作后，当我掩卷沉思时，总要情不自禁地凝视案头上他那幅在病榻执笔撰述的遗照，咀嚼遗照旁的挽联："一身正气，两袖清风，马列长前应无憾；三寸丹心，百磨筋骨，世人眼底自成碑。"顿时，影秋同志的高大形象即浮现在我面前；多年来他对我的谆谆教诲也萦绕脑际。

影秋同志是我一向敬仰的革命前辈，特别是近两年来在协助他整理回忆录——《往事漫忆》过程中，对他一生的光辉历程，又有更多地了解，爱戴敬仰之情与日弥增。深感他是一位兼资文武，德才俱备，集战士、学者、诗人于一身的卓越共产党人。

影秋同志首先是一位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半个世纪之久的老战士，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就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经受过狱中斗争的严峻考验，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按党的指示，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活动于微山湖周围，为创建和开辟湖西抗日革命根据地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解放军战争中，他率队随刘、邓大军渡江南下，为解放全中国屡建功勋。全国解放后，他曾任川南和云南省的党政领导，为恢复天府之国的经济及建设祖国边疆做出突出贡献。一九五七年后，为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他主动要求到教育部门工作，先后任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校长、党委书记、副校长、名誉校长等职，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的专门人材，呕心沥血，勋劳昭著。

几十年来，影秋同志虽然一直担任着繁重的党的领导工作，但无论是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或者是在繁忙的和平建设岁月，都始终不废读书治学，尤其是坚持不懈地研究明清历史。他在青少年时代，就酷爱历史，曾熟读《四书五经》及《史记》、《汉书》、《通鉴》等史学名著。又曾就读于江苏无锡国专，聆听过唐文治、陈柱、钱基博等著名学者开设的"经学史"、"群经概论"，"宋学"。"考据学"课程，具有扎实深厚的文史功底。尔后，他虽长期献身革命斗争，但在艰苦的环境中仍博览群书。最近，有缘读到他自一九四〇年以来的《日记》，看到其中有大量的读书摘记，古今中外的著作，无不涉猎，还有待访书目，自藏书目，甚至常常记有每月读书量的统计与小结，如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一日记着："十一月学习成绩小统计：（一）阅读：《资本论》二版跋、《反杜林论·概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第三章》，…续绥寇纪略》。共计阅读字数197.043字；读书笔记33.088字，每日平均1.035字；日记12.288字，每日平均332字。与十月相较：阅读相当上月70%、笔记相当上月60%、日记相当上月58%。"这则日记有力地表明影秋同志对待学习是何等勤奋与刻苦，特别是作为一名高级领导干部，如此严格要求自己孜孜于学，实令人扼腕赞叹。

影秋同志积多年的研究成果，为我们留下了史学专著《李定国纪年》及多篇明清史论文。他曾详细向我讲述其搜集材料、酝酿撰写《李定国纪年》的过程：解放初，他在川南工作时，看到听到不少有关张献忠和大西军的史料，其中对张献忠及其领导的大西军多有污蔑，

如称张献忠“生性嗜杀”，甚至说他在四川“杀男女六万万有奇”等。其实，明末全国人口不足一亿，张献忠焉能在四川一省就屠杀“六万万有奇”?!这显然是诬蔑不实之词。因此，他深感肃清封建正统史的影响，是史学战线的重要任务。从这时起、他就萌生了要编写大西军及其领袖人物历史的念头。一九五二年，他调至云南省工作，由于大西军后期的杰出将领李定国，最后曾在云南坚持联明抗清，当地保存有大批关于李定国的历史资料和遗迹，他都尽可能地阅读和考察，如其考察了史载李定国抗清驻兵的“缅宁”后，即写了缅怀李定国的诗句：“疾风飘雨卷怒江，宁亡徼外不言降。民族大节农民恨，一代英雄李晋王”。他认为李定国的一生，是与大西军休戚与共的一生，这位农民军领袖追随和领导大西军战斗了三十二年，转战秦、晋、豫、鲁、楚及川、黔、滇、粤等十五、六省，取得了辉煌成绩，直至兵败临死前，还嘱其子女与部属：“宁死荒外，勿降也！”影秋同志为考虑能编写一部李定国的编年史，不仅可以表彰李定国的功绩；而且可以反映大西军发生、发展及其败灭的过程。从此，他便决定编写《李定国纪年》。一九五七年，他调至南京大学工作后，利用了南大的南京图书馆的藏书，进一步搜集有关资料，尽管他是南京大学一校之长，但《李定国纪年》的资料搜集与整个编写工作，既没有找助手协助，更没有请别人代劳，而完全是亲自动手。他甚至利用所有节假日，或者是到北京开会的机会，到处搜集资料。终于历时数年，写出《李定国纪年》，这部国内外第一本全面、系统记述大西军及其领袖人物的专门论著，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直到前两年还有论者指出：“一部有价值的著作，贵在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虽历经世事沧桑，仍永保其学术价值。郭影秋同志所著的《李定国纪年》，就是这样一部值得称道的史学专著（见1982年3期《思想战线》）。

影秋同志在史学方面的贡献，还突出表现在对明清史研究的组织和领导方面。一九六二年，他在南京大学倡导发起了李定国和郑成功逝世三百周年的学术讨论会，邀请了不少著名的明清史专家与会，这是解放后明清史学界的一次重要聚会。在这次会议后，影秋同志还建议编印《晚明史基本丛书》，并得到学者们的赞同，随即成立他牵头的丛书编委会，谢国桢、钱海岳、朱契等著名的明清史专家都是编委会成员。编委会当年就拟定了丛书书目、编例与工作步骤，几经修订，最后确定了七十种，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承担出版任务。后因十年动乱而被迫停顿。最近，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室决定恢复这本丛书的整理校点工作，并计划从八五年七月陆续发稿，三年内出齐。《晚明史笈基本丛书》的出版，必将为研究从万历到康熙这一时期的历史，提供完整的基本参考用书，大有裨于明清史研究。

一九六三年四、五月间，影秋同志调至中国人民大学工作，此后，他为扶植浇灌清史研究所这一清史研究园地，又倾注了大量心血。一九六五年十月，中宣部遵照周总理与董老的指示，决定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并拟在人民大学建立清史研究所，以便编写大型清史。影秋同志为编纂委员会的重要成员，他当时即考虑请戴逸同志主持领导清史研究所的研究工作，授意戴逸草拟成立清史研究所的计划。但不久，“文化革命”的狂风暴雨席卷而来，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被诽谤为抵制“文化革命”的阴谋，建立清史研究所的计划自然化为泡影。但影秋同志对成立清史研究机构始终记挂在心。一九七二年在人民大学已被撤消的情况下，他又向上级提出成立清史研究机构的建议，后被批准暂时成立四十人左右的清史研究小组，影秋同志被指定为研究组组长。于是他直接领导该组制订研究规划，确定研究方向，积极为编写大型清史做好各方面的准备。一九七八年人民大学重新复办，影秋同志带病主持学校的领导工作，决定在原清史研究小组基础上，扩建成立了清史研究所。当时，影秋同志架扶双拐

到清史研究所宣布所领导班子，勉励全所同志齐心协力，为早日编出大型清史努力奋斗，终于使清史研究所步入清史研究的康庄大道。回顾清史研究所产生、发展的历史，可清楚地看到，影秋同志实际上是清史研究所的倡办人和奠基者。

清史研究所成立以来，影秋同志虽久在病中，但一直关怀着其成长和发展，从研究规划、研究项目的确定，到研究人员的进步提高，他都热切关注。他曾多次向我讲述研究清史的重大意义，勉励我终生献身清史事业。八一年我带领本所七九级研究生到南方实习考察，曾看望了当时在上海治病的影秋同志，请他给研究生讲些话。虽然，他已重病在身，但依然亲切地会见了实习的师生，循循指导研究生：一定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二要有系统的专业知识；三要掌握好语言工具，学好外语、少数民族语和汉语；四要勤写多练，提高写作能力和研究水平。

影秋同志还是位革命诗人，他自少年时代就受过诗词格律的严格训练，后来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经常写诗填词，抒怀言志，其诗作已结集成《郭影秋诗卷》公开出版。许多诗作都反映了其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高尚的革命情操、读之激人奋进！

这次，当影秋同志病危已入弥留之际时，我曾赶至病榻探望，又一次聆听到他的教诲，他以微弱的声音对我说：回忆录的整理一定要实事求是，要不溢美，不掩过。乃至此时此刻，他还关心地询问我最近研究什么清史课题，拳拳教诲之情，怎不催人泪下，而这次聆晤，则成永诀。

失去影秋同志这样的革命前辈和良师，我内心的悲痛实难用泪水与笔墨表达，记得一位著名诗人说得好："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影秋同志虽死犹生，他的革命业绩与高风亮节和勤奋的治学精神，将永远活在我心中！他多年来的教诲，我将永远铭记，勤奋学习，认真工作，努力为清史研究添砖加瓦！

汉译本《清代名人传略》第一册即将出版

《清代名人传略》是美国学者恒慕义（不久前卸任的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之父）主编的一部大型清史专著。该书四十年代初问世后，即成为西方汉学家们必备的案头书，而在专门研究我国清代史的学者中影响更大。对此，胡适（他曾任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驻美大使）曾评价道："《清代名人传略》绝不仅仅是一部传记词典，它是今天（指四十年代初）可以看到的一部最翔实、最好的近三百年中国史"。

该书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组织专人翻译。汉译本第一册共收从明末至清雍正朝的人物传记四百三十三篇，另附本书主篇恒慕义及胡适写的序文各一篇。由于这本书着眼于西方读者的阅读和欣赏习惯，因此在观察史事的角度和叙事方法上，和我国的传统史传多有不之处，读来颇有新意和兴味，且不失其学术参考价值。它不仅可做为历史或清史专业工作者们的参考书，一般史学爱好者也可一读，以广闻见。本刊一九八五年第一期载有专文评介此书详情。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戴逸为汉译本写了序言。

据悉，青海人民出版社希望各地区单位、个人欲购者速向该社（青海西宁）予定册数，以便统筹印数。

汉译本《清代名人传略》第一册年内可出版发行。 **（张广学）**